

新中国

人口生育政策变迁研究

朱秋莲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 本书获湖南

金资助 ◆

新中国

人口生育政策变迁研究

朱秋莲 ◎ 著

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变迁研究 / 朱秋莲著 . —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10

ISBN 978 - 7 - 5648 - 2286 - 6

I. ①新… II. ①朱… III. ①计划生育—人口政策—研究—中国

IV. ①C924. 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42786 号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变迁研究

朱秋莲 著

◇组稿编辑：李 阳

◇责任编辑：刘 蔚 李 阳

◇责任校对：刘秋雨

◇出版发行：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地址/长沙市岳麓山 邮编/410081

电话/0731. 88873071 88873070 传真/0731. 88872636

网址/http://press. hunnu. edu. cn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710mm × 1000mm 1/16

◇印张：14

◇字数：237 千字

◇版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ISBN 978 - 7 - 5648 - 2286 - 6

◇定价：38. 00 元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0731. 88872256 88872636

投稿热线：0731. 88872256 13975805626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的依据及其意义	(1)
二、研究综述	(5)
三、研究方法	(10)
四、研究的基本框架	(11)
五、基本概念的界定	(14)
六、本书的创新点	(15)
第一章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理论来源	(16)
第一节 我国历代人口生育政策的自然价值导向	(16)
一、生殖崇拜	(17)
二、“早生、多生、生男”的生育价值观	(20)
三、其他生育思想	(26)
四、中国历代人口生育政策述评	(28)
第二节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制定的理论基础	(31)
一、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出发点	(31)
二、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基石	(32)
三、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特色	(33)
四、马克思主义关于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	(34)
第三节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制定的理论借鉴	(35)
一、马尔萨斯人口理论	(35)
二、西方其他主要人口理论	(38)

第二章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初步探索（1949—1970年）	(42)
第一节 毛泽东的人口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42)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的人口形势	(42)
二、毛泽东的人口思想的形成和反复	(46)
第二节 节制生育政策的初步探索	(53)
一、放任生育的人口生育政策的实施	(53)
二、节制生育政策的提出	(55)
三、关于马寅初“新人口论”的争论	(60)
四、节制生育政策的初步实施	(63)
第三节 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生育政策变迁的历史评价	(69)
一、节制生育政策所取得的初步成效	(69)
二、20世纪50~60年代人口生育政策述评	(70)
第三章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的基本形成（1971—1980年）	(72)
第一节 特殊历史时期人口生育政策发展的历史背景	(72)
一、国际社会新人口理论的发展	(72)
二、“文化大革命”早中期的人口态势	(74)
第二节 新的人口生育政策的产生和发展	(76)
一、新的人口生育政策的产生	(76)
二、计划生育组织机构的建立	(79)
三、以“晚、稀、少”为中心的新人口生育政策实施的历史意义	(80)
第四章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在新时期的历史突破（1980—2000年）	...	(83)
第一节 新时期人口理论研究的拨乱反正	(83)
一、新时期人口理论研究的恢复	(83)
二、新时期人口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	(87)
第二节 把计划生育政策作为国策的战略抉择	(89)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提出	(89)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初步实施及其特点	(93)
第三节 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和完善	(98)

一、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整	(98)
二、计划生育政策的完善	(101)
三、计划生育政策调整时期人口增长率的反弹及其原因 ...	(104)
四、计划生育政策稳定时期人口增长的趋势	(107)
第五章 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在新世纪的不断拓展 (2000 年以后) ...	(112)
第一节 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的态势	(112)
一、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态势	(112)
二、新世纪我国人口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	(118)
第二节 稳定低生育水平——新世纪人口生育政策的又一重大决策	(122)
一、“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的提出和落实	(122)
二、“稳定低生育水平”政策的必要性	(127)
三、“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意义	(131)
第三节 新世纪计划生育的法律保障	(137)
一、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的必要性	(138)
二、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的背景和过程	(141)
三、《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关于生育政策方面的主要内容	(148)
第六章 新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人口生育政策	(152)
第一节 新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概况	(152)
一、新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历史	(152)
二、新中国少数民族人口发展的特点	(155)
第二节 新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分析	(156)
一、新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的选择	(156)
二、新中国少数民族人口生育政策的变迁	(157)
第七章 可持续发展与我国未来人口生育政策的取向	(169)
第一节 人口生育政策与可持续发展	(169)
一、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基本内容	(169)

二、人口生育政策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177)
第二节 未来人口生育政策的取向	(183)
一、目前理论界对未来人口生育政策选择的研究综述	(184)
二、对当代生育水平的判断	(188)
三、适度调整现行人口生育政策的必要性	(191)
四、未来人口生育政策的抉择	(199)
结语	(205)
参考文献	(208)
后记	(214)

绪论

一、选题的依据及其意义

(一) 选题的依据

人口问题是一个复杂综合的社会问题。人从出生到终老总是生活在一定的家庭关系、民族关系、经济关系、政治关系等社会关系之中。在社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主体，总是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在许许多多的社会因素中，一个国家的人口生育政策对其影响至关重要。正如施尔曼、薄兹所言：“没有比当父母关系个人一生未来的大事，没有比适当生育为社会生存更基本的行为模式。”^① 一个国家的人口政策其核心内容就是在现有的生产条件允许下决定这个社会的生育政策。正如马克思所言，“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规律”^②。

从历史的角度来考察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我们不仅能领略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影响人们生育的文化、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差异，更可以使我们体会到社会变迁中各国政府生育政策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19世纪以来，随着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的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进一步丰富，人类自身也进入一个高速发展和增殖阶段。从1900—1970年，世界人口从16亿猛增到36亿，平均每年递增1.16%。1999年10月12日联合

^① [英] 施尔曼、[美] 薄兹，张世文译：《社会与生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92页。

国宣布世界人口已达 60 亿，2010 年已达 69.09 亿。^①然而，长期以来，由于人们对人口、资源、环境与社会发展的相互依存关系缺乏足够的认识和重视，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口的无限制增长，导致了生物圈遭到了难以承受的干扰和破坏，地球负荷越来越重，最终达到难以支撑的程度，使可持续发展成为举世瞩目的全球性问题。因此，制定正确的生育政策，有效控制人口增长，成为 20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面临的人口压力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研究新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正是源于现实的人口问题解决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人口的迅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由此引发了政府对人口问题的高度关注和学术界对人口理论与人口政策的激烈争论。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使这场争论达到了最高峰。此后，反“右”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使这项研究中断了 20 年。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口问题极为严峻，许多研究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的专家、学者忧心忡忡，陆续恢复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纵观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所经历的历程，虽然我们走了不少弯路，但我们仍然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从 20 世纪 50~60 年代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导致人口高速增长，到 70 年代，我们实施“晚、稀、少”的节制生育政策，使生育水平大幅度下降，再到 80 年代全面实施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使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已基本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最后到当代少生、优生、优育观念深入人心，人们从计划生育中得到了空前的实惠，中国已成功地控制住了人口的迅速增长。成绩是喜人的，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极大的。许多专家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我国以生育政策为核心内容的人口政策也带来了许多负面影响，譬如人口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调、老龄化程度加剧等等。

多年以来，计划生育的主要矛盾是传统的生育文化与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碰撞。30 多年的计划生育国策，加之经济发展使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群众传统的生育观念和意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育意愿和国家生育政策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小，如何正视这一客观现实，消除计划生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合理有效地调整人口生育政策，将是我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编：《中国统计年鉴 2011》，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045 页。

国目前所面临的一个非常重大而又迫切的课题。

(二) 选题的意义

计划生育是生育政策的一项巨大变革，“控制人口增长，是当前所有发展中国家的紧迫任务，在决定人口增长的四个要素中，死亡、迁移和时间都不是我们能够有效控制的因素，或者根本无法控制；只有人口出生率这个因素是能够控制的参数。研究如何用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出生率，使人口最终达到某种理想状态，是今后我们努力研究的课题”。^①

笔者一直从事人口学与社会学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并且亲身感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对中国社会的巨大影响，现将某些原始的感性认识和理性思考结合在一起，从党史的角度，系统地梳理和研究新中国的人口生育政策的变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一，对新中国生育政策的变迁进行学理探讨，对拓宽中共党史的研究领域，加强边缘学科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人口学是研究人口发展、人口与社会、经济、生态环境等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和数量关系的科学总称。^② 人口生育政策它是人口学研究的一个分支。它受国家某一时期的人口政策支配，它主要研究“实施政策的行为主体对具体的人口生育行为所持有的态度，或者说实施政策的行为主体为影响或制约具体的人口生育行为所制定的法令、法规和措施的总和”^③。从我国的生育政策变迁的历史进程来看，其核心内容是计划生育政策。从对现有资料的检索来看，除了孙沫寒的《中国计划生育史稿》和史礼成的《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田雪原的《中国人口政策 60 年》从历史学和人口学的角度对中国计划生育问题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外，在中共党史的教科书中鲜有专门章节论及计划生育问题。而且前两本书均成书于 20 世纪 80 年代，涉及的内容有限。随着时间的变迁、随着人们对计划生育政策逐步接纳和认同、随着生育政策的逐步完善及学术界对计划生育政策研究的不断深入，涌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从中共党史这个学科来看，鲜有专著对中共的生育政策在理论上做系统的研究。这些都为后学者对我国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作进一步学理探讨留下了广阔的研究空间。面对新中国生育政策在实

^① 邓辛未：《中共计划生育的分析》，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第 6 页。

^② 邓铮主编：《人口学辞典》，北京：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2 页。

^③ 汤兆云：《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 页。

践过程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存在的问题，我们有必要立足于党史研究领域，利用跨学科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生育政策变迁史进行仔细研究，可以使中共党史呈现得更加丰满。

第二，把现代中国的生育政策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对社会发展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人类社会能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其实关键还在于人类自身。其中人口数量的急剧增长，则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中国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口压力之大可想而知。我国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而一旦人均化就排在了世界的后列，且过多的人口导致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资源的滥用和过度开采、环境的污染、大量贫困人口的存在等问题无一不与人口过多有关。作为一个影响国计民生的战略性重大国策、广泛作用于每一个家庭、同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人口生育政策如何变迁是事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因为“人口问题不仅关系到一个国家政治、财经、军事、文教、房屋、社会、交通运输、医药原理、环境污染、自然生态等，而且也是一个国家制定其基本政策、法令规章的依据”。^①因此，对我国的人口生育政策变迁进行研究，可以为和谐社会和全面小康社会的构建创造合适的人口环境。

第三，研究当代中国生育政策的演变过程，揭示其演进的规律，对于改变人们的婚育观念，建立合理的人口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生育虽然是个人行为，但它受社会的传统文化、历史条件等一系列社会因素的影响。生育政策是政府行为，同样也要受诸如上述社会因素的影响，政党和政府的决策，必须由每一个个体来完成。长期以来，迫于发展经济的压力，新中国的生育政策的重点是放在控制人口数量的目标上，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效在客观上都掩盖和淡化了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方面的问题。无论是在认识上还是在实践中，在处理人口数量、质量和人口结构三者的良性互动上都显得投入不够、执行乏力，缺乏长期发展的计划。因此，新中国的生育政策从制定到执行，都走了不少弯路，经历了一个曲折反复的过程。我们对新中国人口生育政策进行深入研究，就是对人类发展历史自身的研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我们相信，在科学发展

^① 邓辛未：《中共计划生育的分析》，中国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9页。

观的指导下，系统地对新中国生育政策变迁开展研究，理清变迁规律，对于改变人们的婚育观念，建立合理的人口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二、研究综述

(一) 关于生育政策的研究

政策是国家、政党为达到一定的目的，根据自己的政治路线和行动目的，结合当前情况和历史条件制定的一切实际行动的准则。因此，我们可以认为，生育政策应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府的主观态度，即实施政策的行为主体对其人口发展过程和行为所持有的态度；二是政府的客观行为，即实施政策的行为主体为影响和制约人口发展过程，对行为人所制定的法令、法规及措施的总和。^①

理论界对生育政策的讨论也非常热烈。有人认为，生育政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从社会、经济、政治、资源和生态环境的综合战略利益出发，同时考虑到大多数群众的接受程度，对其人口的生育行为所采取的政府态度（冯立天，1999）；也有人认为，生育政策是指国家直接调节和直接影响人们生育行为的法令和措施的总和（阎海琴，1993）；随着研究的深入，有人把生育政策归纳为狭义的人口政策，其结果直接制约和影响着人口自然变动过程的数量和质量（张纯元，2000）；作为计划生育政策，杨魁孚认为它是党和国家为使人口增长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促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全国生育过程进行有计划的调节而制定的指导全民生育行为的准则（杨魁孚，1997）。

以国家对待生育的态度和影响、干预生育的作用方向为标志，生育政策可分为鼓励性生育政策和限制性生育政策。鼓励性生育政策是指一个国家通过直接或间接的经济、行政、法律和技术措施来影响、干预人们的生育行为，鼓励早婚、早育、多育，限制不婚不育，禁止或惩罚堕胎、避孕、溺婴、弃婴，以达到促进人口较快增长的目的。目前实行这种生育政策的国家，主要集中在欧洲、大洋洲和西亚地区。限制性生育政策则刚好相反，是指一个国家通过多种措施鼓励人们晚婚、晚育、少生、优生，以降低人口增长速度，稳定或缩小人口规模的政策。今天，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

^① 汤兆云：《当代中国人口政策研究》，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5年版，第9页。

走上了这条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的迅速增长产生了一系列的问题，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开始注意到人口问题的重要性，由此引发了理论界对人口问题的大讨论。邵力子认为，应当从实际上指导并供应有关避孕的方法和物品（邵力子，1954）；紧接着，《健康报》、《光明日报》发表社论，倡导实行计划生育。1957年上半年，钟惠澜、邓季惺、吴景超、孙本文、陈长蘅、陈达、王淑贞、蒋学模等著名学者纷纷撰文提倡节育。1957年6月，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发表了《新人口论》，将讨论推向了高潮。但随之而来的反“右”倾运动中止了人口政策中生育问题的研究。

人口理论、生育政策研究的恢复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而我国人口研究队伍的形成是在1973年全国普遍推行计划生育以后。人口学界在生育问题上最大的贡献就是扫清了实行计划生育的理论障碍。

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冯立天、张纯元、李竞能等对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进行了深入研究，认为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生产构成了社会生产内部的矛盾对立体，它们总是处在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渗透的关系中螺旋式上升发展。在此基础上，从理论上明确和解释了中国计划生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冯立天，1982；张纯元，1983；李竞能，1982）。几乎与此同时，梁文达等人利用理论界的研究成果，大力对“两种生产理论”和计划生育“利国利民”进行宣传（梁文达，1980；曹明国，1982；刘宏康，1983），使全国各个阶层都充分认识到了中国人口问题的艰巨性和紧迫性，坚定了控制人口的决心。

（二）关于生育政策的分期

《中国计划生育史稿》把中国计划生育的历史划分为盲目生育时期、节制生育时期、计划生育时期和计划生育的发展时期（孙沐寒，1987）；《中国计划生育活动史》则对计划生育的历史进行了回顾，从计划生育思想的确立、指导思想的变化、政策的制定以及工作成果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括（史礼成，1988）。侯文若把我国人口政策的制定分为五个大的阶段：控制人口思想的提出；人口政策萌芽；人口增长失去控制；人口政策开始形成；人口政策最终形成并进一步完善。^① 冯立天等将人口政策分为九个时期：中

^① 侯文若：《中国人口政策评估》，《人口研究》1988年第6期，第50—51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 1953 年（不成文的鼓励人口增长的政策）；1954 年至 1957 年（由严禁节育到逐步主张节制生育）；1958 到 1959 年（已孕育起来的上层控制人口思想受到严重干扰）；1960 年至 1966 年“文化大革命”发动前夕（计划生育思想复苏与开展工作）；1966 年至 1969 年（计划生育政策未变，但丧失实施的社会环境）；1970 年至 1980 年初秋（全面推行计划生育、形成合情合理的生育政策）；1980 年秋至 1984 年春（计划生育政策由晚、稀、少向独生子女人口政策紧缩）；1984 年至 1991 年（完善计划生育政策形成各地方计划生育条例）；1991 年至 1999 年（现行计划生育政策的稳定）。^① 张纯元以人口政策变动的状态把人口生育政策划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1 年）是限制人口增殖生育政策的思想准备阶段；第二阶段（1962—1969 年）是限制人口增殖生育政策的提出及其在部分市、县的试行阶段；第三阶段（1970—1980 年）是限制人口增殖生育政策的逐步形成和全面推行阶段；第四阶段（1980 年秋—1984 年春）是限制人口增殖生育政策在生育数量上的进一步抽紧阶段；第五阶段（1984 年春—现在）是限制人口增殖生育政策的进一步调整和稳定阶段。^② 张克武把人口政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初，在总体上是普遍鼓励发展人口和对人口增长无控制的阶段；第二个阶段，20 世纪整个 70 年代，为酝酿实行计划生育，逐步开展控制人口增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至 90 年代，为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阶段，并执行较严格地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着力于提高人口素质的政策。^③

（三）对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方面的研究

《走中国式的计划生育工作道路：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三十年》，对 1949—1984 年 35 年间中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道路进行了历史性的回顾，肯定了成绩和经验，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有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组织保证（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1984 年）；《中共计划生育的分析》对中国内地的人口理论的根据、计划生育的意义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剖析和评价（邓辛未，1988）；《社会大系统中的人口问题》，说明了计划生育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

^① 冯立天：《中国人口政策的过去、现在和将来》，《人口研究》2000 年第 4 期，第 89—90 页。

^② 张纯元：《中国人口发展评论：回顾与展望》，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③ 张克武：《新中国建立后的人口理论与政策概观》，《甘肃社会科学》1993 年第 5 期，第 40 页。

程（朱楚珠、张羚广、林江，1988）；《我国人口发展态势与对策探讨》对我国现行生育政策的效果及其对未来人口发展的影响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曾毅，1990）；《中国计划生育概论》对计划生育的地位、作用和任务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张维庆，1998）；《人口学百年》则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分析方法，把计划生育政策放到历史年代所处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对其必要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查瑞传，1999）。

（四）从计划生育所取得的巨大效益方面进行的研究

《中国计划生育效益与投入》全面、科学、准确地反映了20世纪70年代以来计划生育工作取得的巨大经济、社会和环境以及个人家庭效益，阐明了计划生育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杨魁孚、陈胜利、魏津生，2000）；《新世纪的人口与计划生育：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理论与实践》，重点研究了在新世纪继续维持人口低生育水平对我国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意义，并从理论和实践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论证（薛宝铭、张原震，2003）。

（五）关于生育政策的调整问题研究

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由此引发了对生育政策是否需要调整的讨论高潮。主要有三类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现行生育政策应该进行调整，即提倡放开二孩生育。在群众生育意愿较低的情况下再去调整生育政策，即放开生育政策后，生育水平也不会反弹（乔晓春、任强，2006）；未来的生育模型应该“以数量换结构”（周丽萍，2006）；生育政策调整的方向应该是回归温和，与时俱进，实行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质量、改善人口结构三者并重（丁金宏，2006）。胡鞍钢强调，在低生育水平得到初步稳定后，人口增长的趋势逐渐减弱的大环境下，可逐步从一胎向二胎放开（胡鞍钢，2009）。蔡昉认为“在经济又好又快地稳定增长、低生育水平已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反弹的条件不充分，可以慢慢地放开二胎生育政策”（蔡昉，2008）。林毅夫从战略发展的高度，“赞同在文化水平比较高，经济基础比较好的地区，逐步放开二胎”（林毅夫，2006）。纪宝成“在人口总和生育率长时间低于警戒线以后，如果不执行放开二胎政策，将会严重抑制经济社会增长”（纪宝成，2009）。穆光宗认为“人口大量减少，特别是青壮年劳动力的大量减少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主张放开二胎”（穆光宗，2009）。

第二种观点认为：应该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变。我国的人口与资源的

不协调现象在今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依然十分严重，而且还会越来越突出。我们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计划生育工作不仅不能放松，而且还应该加强（张勇，2006）。翟振武认为“无论在生育率低的城市，还是在生育率较高的农村，都要坚持现行的人口生育政策，稳定低生育率”（翟振武，2008）。张维庆认为“中国人口总数过多、基数过大、增长惯性强劲，仍是当前中国的人口发展的主体趋势，因此，坚持现行政策不动摇仍是当务之急”（张维庆，2006）。程恩富则强调实行更严格的“一胎化”政策，认为“中国人口已远远超出了我国资源、环境所能承载的限度，如果不实行更严格的人口限制政策，会破坏有关长远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程恩富，2009）。生育政策的放开，会导致部分独生子女家庭突然获得生育第二胎的权利，于是纷纷生育（郭志刚，2001；宋健，2006）。生育政策的不稳定，会扰乱人心（李建新，2005；陈友华，2007）。倡导仍把人口数量控制作为首要目标（王涤，1998；周皓，2000；尹文耀等，2001；叶文振，2002；黄荣清等，2004；李小平，2004）。

第三种是尽快调整甚至取消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生育限制。易富贤“人多出现各种才能的机会也会多，否则，泱泱人口大国可能名不副实，中国现在就放开生育”（易富贤，2007）。邹至庄“认为中国人口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当代中国的人口问题不是数量多了，而是数量少了，并且计划生育政策只是针对某一代人的，不能长久不变。因此，在当前特殊的人口形势下，是该改变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了”（邹至庄，2009）。

（六）少数民族的计划生育研究

邓宏碧《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对广义人口政策的方方面面，都或多或少、直接或间接地有所涉及，该书以大量的篇幅，论述了少数民族的生育政策和实施状况与问题，提出了完善政策的设想，在论述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全面性、系统性方面开了先河^①。续西发《中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概论》一书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工作的发展历程，总结了少数民族实施计划生育工作的经验，“是国内第一部具有填补空白意义的、学术性很强、应用价值较高的研究少数民族计划生育的专著”^②。张天路对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发展变化做了研

^① 邓宏碧：《中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研究》，重庆：重庆出版社1998年版。

^② 续西发：《中国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概论》，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究。他认为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推行经历了三个阶段：积极推行“人口兴旺”政策阶段（20世纪50年代—70年代初）；酝酿开展计划生育阶段（1971—1981年）；正式开展计划生育工作阶段（1982年—现在）。^①

王红曼认为，少数民族人口政策是我国人口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以一定的人口理论为基础，并结合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和人口状况等实际情况而制定的特殊人口政策。王红曼分析了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理论和现实依据、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行计划生育的可行性，介绍了少数民族人口政策的基本内容及实践、实施情况，认为我国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生育水平高的势头已经基本得到控制，一些少数民族的人口增幅和人口年增长率已经与汉族持平甚至于低于汉族；少数民族的人口素质得到逐步提高；制定并完善了符合少数民族地区实际的少数民族计划生育政策。^②

三、研究方法

生育政策不仅是一个操作性很强，而且是一个极具科学性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微观层面，而且是一个宏观调控的问题。因此，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人口理论为指导，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方法，探寻新中国生育政策演变的基本规律，对未来的发展提供借鉴。具体来说，本书主要采用了以下几种基本方法：

首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本书研究的根本方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是社会或历史演进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决定关系，而是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原理至今仍对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有巨大的阐释力。“生产力决定论”似乎也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其实恰恰是对之在某种程度上的偏离。因为它只看到了决定作用，而忽视了反作用。本书摒弃这种片面的单向思维，从它们的相互作用上来把握新中国生育政策的演进过程，并在此基础上对新中国生育政策的演进进行合理的诠释。

^① 张天路：《80年代以来少数民族人口的新态势》，《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第72—73页。

^② 王红曼：《少数民族人口政策及其实践》，《人口学刊》1999年第4期，第81—82页。